第一章

抗战初期的后方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进攻卢沟桥，8月13日，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初期，战争主要在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国民党政府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了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节节抵抗，试图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地区，为抗战后方基地的建设，战区大量人、财、物转移到大西南，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争取时间、创造条件。

此时，远离战场的湖南是国民政府支持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之一。为建成这一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与推动下，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战火烧到湖南之前，初步把湖南建设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为初期抗战和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湖南在国民党整体战略中的战略地位

在国民党整体战略中，湖南一开始便是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建设的。

从战略上看,国民党政府采取持久战略,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对中日军力对比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的分析基础上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在质和量方面都占绝对优势。当时，日本陆军常备师有 70 个师团,一个师团约 27 000 人,马 5 800 匹，步骑枪 9 500 支,轻重机枪 685 挺,掷弹筒 576 具,各种火炮 108 门,战车 24 辆,且能随时配属特种部队;它的海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 3 位,拥有 190 余万吨;空军拥有 2 700 架飞机。而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能使用的部队，步兵为 80 个师 29 个独立旅、团,9 个骑兵旅团又 16 个团，海军只有 59 000 吨,飞机仅有 600 架,且装备落后，战斗力弱。国民党一个师平均是 10 923 人,步骑枪 3 831 支,轻重机枪 328 挺,掷弹筒 243 具,火炮 46 门。据估计,当时日军 1 个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于中国军队 8 个步兵师的战斗力。因此,中国军队要迅速战胜日军是不可能。但日本地小人少,各种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因此,它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相反,中国的土地 31 倍于日本,人口 5 倍于日本,且战略资源丰富,能支持长期战争,通过持久战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从日军进攻的方向来看，国民政府认为，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已取得了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基地。根据日军不断在华北和上海挑起事端的情况判断,日军以东北为基地,先期占领平、津地区,然后循平汉路或津浦路南下,夺取武汉或南京,并用海军封锁中国沿海港口或在任何港口登陆,这将会占领平、津、宁、沪、汉口、连云港、青岛等地,在这诸多城市中,又以汉口地位最为重要。因为,汉口北有平汉铁路通北京,南有粤汉铁路通广州,扼南北两大铁路的交汇点,出汉口可以溯长江西上,进取宜昌、重庆,由武汉顺长江东下,可到达南京、上海。如果日军由北向南先期占领汉口,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则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可以将中国东西遮

断,南北隔离,而且可以使汉口以东长江下游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在中国西迁用来建设抗战基地之前,将之全部占领,使中国无法支持长期抗战。同时,若日军再向东,可以捕捉国民党军队主力在平汉与粤汉铁路以东地区,使国民党军队被迫背海作战,受东西两线夹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延缓日军占领武汉就有重大意义:一是迫使日军改变作战线,使它只能压迫国民党军队向西循通向大后方的补给线撤退,无法强迫国民党军队过早与日军作战,从而保持战斗力,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二是可以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稳定战局,以待反攻;三是可以争取时间,将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的重要工业设施及人员迁往大后方,为持久作战创造条件;四是国民党军队主力可以逐次向平汉线以西及湘鄂边境转进,控制有利地形,确保抗战基地湘、黔、滇、川、陕的安全。

根据上述分析,国民政府为改变开战后的不利局面,争取主动,制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并迫使日军将由北向南的作战改变为自东向西作战,转换敌我态势,相机转移攻势,取得最后胜利。在这一战略方针下,湖南不是作战区,而是邻近战区的后方基地。

根据国民政府的持久战略方针,国民政府从 1933 年开始着手抗战准备工作,1935 年后全盘铺开。在国民党的抗战准备中,国民政府是将湖南作为抗战后方基地来建设的。

首先,从战场划分来看,1932 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 11 个国防区域,即冀鲁晋豫区、陕甘宁青区、川黔滇区、粤桂闽区、江浙皖区、湘鄂赣区、热察绥区、东三省区、外蒙古区、新疆区、西藏区等,开始从事国防建设。1935 年,随着中日全面战争危险的加剧,国民政府对未来抗日战场划分为山东区、冀察区、河南区、徐海区、山西区、绥远区、江苏区、浙江区、福建区、广东区等十大区域

31 个阵地。湖南与陕甘宁青、广西、滇黔、川康等省份一起,被列为警备区。

其次,从国防工事的修筑来看,当全国国防工事的修筑以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各战略要地推进。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拨了巨款,在京沪地区修筑了淞沪阵地、吴福阵地、锡澄阵地;在沪杭甬地区修筑了乍平嘉阵地、海盐一嘉兴阵地、乍澉甬海岸阵地;在南京地区修筑了南京城厢及沿江及东南阵地、江西北面阵地、镇江阵地、芜湖阵地;在长江以北地区修筑了南通靖江阵地、淮阴附近阵地、蚌埠阵地;在山东修筑了鲁南阵地、鲁东阵地、鲁北阵地;在徐海地区修筑了海洲附近阵地、徐州附近阵地、运河阵地;在河南修筑了漳河北岸阵地、道滑睿阵地、汲新辉阵地、安阳淇阵地、封延阵地、焦博沁阵地、内黄附近阵地、巩洛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还在广东、福建、广西修筑了大量国防工事,总数达 4 000 多个,耗资达 20 875 567元。同时在各江海防要塞构筑工事,购置大炮、储存弹药。但对湖南不仅未拨任何经费,也没有修筑一条国防工事。湖南战场的国防工事一部分是旧有的,大部分则是抗战逼近湖南时,张治中动用湖南财政号召湖南军民修筑起来的。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与南京国民政府把湖南作为抗战后方基地的指导思想有关。

再次,从兵役推行情况来看,1933 年,南京政府颁布《兵役法》,1936 年 3 月 1 日实行,同年 9 月 8 日,颁布首次"征兵令",为使抗战发动后国民党军队有稳定的兵源,1936 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将全国划为 60 个师管区,每一个师管区配置一个整编师、一个整理师,首次在苏浙皖赣豫鄂六省设立 12 个师管区,1937年春天,又在苏赣豫鄂湘闽六省设立 8 个师管区。湖南先后设立了衡郴、宝永两个师管区,同时又设立了沅辰、长岳两个预备师管区,把湖南当作一个重要的兵源基地。

最后,从资源开发和管理方面看,南京政府对湖南的军事备战虽不重视,但对湖南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对湖南经济的发展却

十分重视。湖南有丰富的煤、铁、铅、锌、钨、锑等战略物资，为支持长期抗战，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对湖南的战略物资进行了调查，积极支持和推动湖南重工业建设，加强对特种矿业的统制。1934 年 1 月，长沙成立锑业管理局，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与湖南当局合作，投资 40 万元兴建湖南模范炼锑厂，年产 4 000 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来湘考察有色金属，派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委会主任来湘勘定厂址，征地 9 000 多亩，并于 1936 年开始在湖南投资兴建湘潭钢铁厂、茶陵煤矿、湖南铅锌矿、湖南潭家山煤矿、湖南模范炼锑厂、湘潭电工器材厂，并与航空委员会合作，筹建湘潭飞机发动机厂，1937 年 2 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湖南的冶金、燃料、电气、机械等重工业的建设，并且放在鄂、川、桂、黔、赣、豫、陕等省的优先地位，力图在三年内使“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等五种工业，树立坚固之基础，以达自给之目的。”（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 年 2 月）把湖南建成抗战的物资生产和供应基地。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加强湖南的公路建设。南京政府致力于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后方基地，将大量人力、物力迁移至大后方，湖南的战略地位就日益重要，成了联结前线和后方的枢纽。因此，南京政府大力加强湖南的交通建设，兴建公路和铁路。先是将湘省公路与赣、鄂、粤等省的公路连结起来，接着督修湘黔公路。蒋介石对湘黔公路的修筑非常重视，1935 年 2 月 20 日蒋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对于湘黔公路，务请湘省由桃源经新晃筑至镇远。今年湘省建设以此公路为中心工作。至于镇远至湘边段之经费，准由黔土运费中设法提取，决不令湘省独负，但须限本年七月完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三）P461）为加强对公路运输的管理，1936 年 10 月，蒋介石又要求川、湘、滇、黔、陕五省公路，对于各省城镇间联络之运输，应由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央统制联运。在铁路建设方面,三大铁路在湖南交轨,浙赣铁路直通株洲,于 1937 年夏天全线通车,浙赣铁路的筑成,使湘、黔、粤、桂皆可不经长江而有陆路交通与京沪连为一气，并能贯通西南东南诸省。粤汉铁路韶关至株洲段从 1930 年动工,1937 年夏天完成;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全长 360 公里,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开始筹划,10 月开始动工,1938 年 9 月通车,它成为通往西南的重要要道,缩短时间二倍以上。湘省公路与鄂、赣、粤等省公路的连接,湘黔公路的筑成以及三大铁路在湘省的接轨,使湖南成为名符其实的进出大西南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对支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节　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

一、湖南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

在南京政府的抗战方针指导下，湖南省政府从 1935 年开始，在积极反共的同时，也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工作。

首先，在交通方面，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意旨，湖南省政府调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在全省修筑了联络全省城乡的公路网,并将公路干线与粤、川、黔、赣等省公路连接,构成通往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公路网。1933 年到 1935 年,全省完成公路修筑 2 162 公里,共支付筑路费 300 万元,使全省公路总里程达 4 000 余公里。1935 年 8 月 21 日,湘桂公路全线通车，8 月底,湘黔公路全线贯通。8 月 23 日，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筹备修筑京湘、川湘公路。京湘公路由长沙、浏阳直达南昌,川湘公路取道宁乡、溆浦、沅陵以达重庆。1936 年 2 月 7 日,蒋介石致电湖南省政府,要求川湘公路应速进行,平(江)通(城)路限 3 月 15 日前完成。2 月 29 日,川湘公路在沅陵设立工程处，由省建设厅厅长余藉传兼任处长，省公

路局局长刘岳厚兼任副处长。3 月 9 日,何键电令川湘公路沿线各县开始征工修路,4 月 22 日,川湘公路正式破土动工。该公路全长 1 390 公里,其中在湘境长约 240 公里,需拓土石方 100 万立方米、石方 2 万立方米,大小桥梁 1 400 余个,需经费 300 万元,川湘公路修筑历时一年,于 1937 年 1 月 15 日全线通车。该公路在湘境接长沅、湘黔两公路,在川境接成渝、川黔两公路,成为战时沟通前线与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命脉。

在积极修筑公路的同时,湖南省政府还投入大量人财物力修筑湘境铁路。经过三年努力,1936 年 4 月 30 日,粤汉铁路全线接轨,5 月 15 日,株洲至衡阳段铁路正式通车,8 月 23 日,衡阳至广州段正式通车,9 月 1 日,武昌至广州的直达火车开通。在粤汉铁路全线贯通之际,南京政府决定修筑湘黔铁路。3 月 22 日,铁道部湘黔铁路工程处在长沙成立,7 月 20 日,湘黔铁路工程局在长沙成立,由铁道部派候家源任局长兼总工程师,李育为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经过一年的筹备1937 年 6月 7 日,湘黔铁路正式开工修筑,但在 1938 年 10月底,因日军进攻湘北,该路修筑湘潭至蓝田160 公里后即告停工。1936 年 12 月,湖南省和广西省与铁道部商定合资修筑湘桂铁路,所需资金 3 600 万元,由铁道部承担一半,湘桂两省合承担一半。1937 年 2 月,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电商修筑湘桂铁路事宜,在此基础上,2 月底,铁道部与湘桂两省商定湘桂铁路办法,8 月23 日,为督修湘黔、湘桂铁路,铁道部在衡阳设立办事处,以王国华为主任。9 月 10 日,湘桂铁路湘段工程开工,湖南省政府令沿线各县每县征调民工 15 000 人,每人工作 30—60 天。经过全省人民一年的努力,湘桂铁路于 1938 年 9月 27 日全线通车。

此外,湖南省政府还架设了湘赣鄂长途电话线,疏通了汉口至常德、长沙至常德、长沙至衡阳的水道。所有这些,为战时疏散人口、调运物资、转运兵员等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在军事上,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是防空。1935 年初,湖南省政府派遣省府秘书、省保安处、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市党部、警察局等单位 10 余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在杭州笕桥开办的防空训练班学习，以参加学习的人员为基础,于 1936 年 10 月在长沙成立防空协会,由市长何文元兼任协会主席,1937 年又成立了长沙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省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兼任主任。防空领导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防空常识教育。1936 年 5 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中山堂举办首次展览会,展出了各种防空警报器、炸伤人体救护室,并作示范表演,展览会举办了 10 天,先后前来参观者达 10 余万人。这年冬天,省防空指挥部派人到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作防空知识讲演,1936 年 9 月上旬又举办防空宣传周。这些活动，普及了防空知识，提高了各级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二是建立防空监视哨(队)。1936 年 9 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长沙防空情报所,掌管和指导防空监视哨(队)的工作。同时在省警察局的钟楼上、国货陈列馆、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防空报警台、火警瞭望台,在长沙县泉塘设立第一号特别哨,在杨桥、麻林桥、靖港、金井等分别设立独立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防空哨(队)不仅在长沙市区得到加强,而且在全省各地分设了数百个防空监视哨及补助哨。这对于提早防止敌机空袭、减少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述防空准备工作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种消极的防空,一种官方的防空,根本还没有考虑到如何保护城市,如何保护人民免遭敌机轰炸,还没有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难以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湖南的防空准备工作渐趋积极。1937 年 8月至 10月,省政府向民众募捐数十万元,购置了德制欧利根 2厘米口径小型高射炮 24 门,勃朗宁高射机关枪 50 挺,组成了湖南省高射机炮团,加强了对省会长沙和重要城镇的防

空保卫,同时安装防护设备,在长沙天心阁、国货陈列馆、水上警察局、警钟楼、纺纱厂等 5 处设置了警备台，装有电动警报器或手摇警报器,设置专人发警报,并在市区各处装有铁钟、警报球、警报旗、警报钟等。白天空袭则高挂红球二个或大红旗一面,疏散则挂红球一个或大红旗一面,解除警报则挂白球一个或白旗一面 紧急警报则将红旗或红球取下 晚上空袭则高悬红灯一盏,解除警报则将红灯取下。到 1941 年,长沙市有警报器 174 个、防空壕 757 个、防空洞 298 个、避难所 141 个、担架 20 副、药品约值 10 000 元、病床 5 张、水龙头 3 架、腕力唧筒 100 个,浏阳、宁乡等县设有救火机、灭火机、水龙头等数百个。为避免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1936 年 9 月，省保安司令部在长沙组织了一次防空演习，长沙市防护团、警察系统、省会防空军、高炮高机部队、探照灯部队等演习了轰炸机空袭和夜间轰炸、防空部队发现敌机后的通讯联络、发现火警后的消防、救护队对负伤中毒者的救护、空袭时警备部队对市区的警备等 15 个项目,演习前后持续了三天,昼夜进行,约有 7 000 余人参观了演习。

二是加强兵役管理，积极办理兵役工作。根据国民党政府在湖南设立师管区的决定,1936 年 12 月，省兵役管理局设立辰沅师管区、永顺团管区，并令各县兵役科积极办理兵役事宜。1937 年 4 月 7 日,省政府致函各机关,军政部在湖南增设两个师管区,一为保永师管区,由唐俊德为司令,司令部设在邵阳,一为衡郴师管区,司令为王时,司令部设在衡阳,在全省实行征兵,其办法是 首先登记各县在乡军人,每月酌给一定津贴,以备将来随时征调,其他普通人民以乡镇为单位，每百人抽调二人，以抽签决定应征与否。这就为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准备了条件。

1935 年后，湖南省政府秉承南京国民政府的旨意，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战意识,增强了湖南人民的国防观念，同时也为湖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准备

了一定的人心、人力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铁路公路的修筑,使湖南成为大西南和联系中原以及东部地区的咽喉和枢纽，对支持持久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湖南的抗战准备工作是消极的、有限的,十分不彻底。它对湖南的军事防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特别是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视人民如仇寇，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政策,湖南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蕴藏在人民中的抗日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湖南的抗日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这就使得湖南落后于日益发展的抗日救亡的形势，也使湖南在抗战爆发后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二、国共合作在湖南的建立

1. 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湖南抗日后方基地筹建的重要一环,而国共合作局面在湖南的出现，又是以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基础的。

九·一八事变后，素具反帝爱国传统的湖南各界人民纷纷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刊物,举行集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9 月 23 日,长沙市有 200 多个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各大小报刊纷纷刊载消息。9 月 25 日,长沙各界群众约 20 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武装侵占辽东的示威大会，成立了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并作出了‘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决议。在衡阳、湘乡、邵阳、常德等地都召开了民众抗日救亡大会。在此基础上，全省各地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如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新闻、邮电、教育界抗日救日国会等等,在衡阳还组织了 5 000 余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起

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深知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再也压抑不住，乃转变策略，试图对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以限制和控制。7月18日，省党部约集省民众俱乐部、省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民众常识指导会、市党部、市政府等单位，在国术俱乐部筹组长沙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函请省农会、长沙市工人提倡国货救国会、省商联合会等组织参加，力图将湖南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置于其管理控制之下，以便控制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7月21日，省党部电令各地民众团体、学校、报社、各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不宜早露剑拔弩张之态"，"致减少国际同情，给日本号召国人之口实"，只能"多作文字及口头宣传"。尔后，又制定了《统一募捐及慰劳工作纲要》，规定各地募捐慰劳团体，必须"经省(市)党部核准"，"募捐及慰劳工作应在省(市)党部监督指挥之下方可公开进行。"(湖南省档案馆藏　省党部文电)湖南省政府也规定"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应由政府拟定整个计划"(湖南省档案馆藏)，为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扼杀湖南人民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的积极性是压抑不住的，他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的组织、推动与领导下，毅然奋起，冲破国民党省政当局的种种禁令，排除其阻止和破坏，纷纷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救亡刊物。7月24日，在从平、津、沪、宁各高校回湘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与长沙工商学各界推动下，由湖南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民众常识指导会、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发起，将长沙人民抗敌后援会扩大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以统一湖南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在党政上级机关指导之下，努力抗战工作为宗旨。"它下设总务、宣传、调查、征募、组织等五个部，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其组织活动。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通令各县组织分部，并派代表到各县帮助指导，到8月下旬，平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益阳、浏阳、衡山、醴陵、芷江、长沙、常德、武冈、邵阳、宁乡、新化、乾城、零陵、桃源、湘乡等县，先后成立了县级抗敌后援会，使湖南抗日后援会成为湖南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对推动和团结湖南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37 年 10 月 7 日，另一个全省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 600 余人，讨论通过了《文抗会章程》，确定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选出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骥等 23 人为理事，曹伯韩、谭丕谟等 11 人为候补理事。10 月 19 日，文抗会第一次理事会议选出吕振羽、李仲融、廖伯华等为常务理事，设立研究、宣传、组织、总务四部。与此同时，湖南妇女抗敌后援会、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职业界抗敌后援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成立起来。

随着救亡团体的建立，抗日救亡刊物也大量创刊，如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创办了《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由曹国枢任社长、肖敏颂为总编辑的《前进》周刊、杨国荣等主编的《民族呼声》十日刊、黎澍主编的《火线下》三日刊、张天骥主编的《大众日报》、廖申之、唐菜前主编的《现实旬刊》等，到 1937 年年底，全省出版刊物达 40 余种，这些刊物从不同角度介绍国共两党抗战的情况，发动民众起来抗日，拥有众多的读者。

其次，湖南人民各救亡团体采取不同形式，或通电、或致函，表达了对抗战坚决支持的态度，敦促国民党政府、湖南省政府当局立即对日宣战，发动人民实行全面抗战。

7 月 9 日，长沙邮电员工联合会致电卢沟桥将士，激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谋取最后胜利，表示长沙全体邮电工人，誓为他们的坚强后盾。7 月 13 日，湖南大专院校学生成立“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通电慰问卢沟桥官兵，鼓励他们坚持抗日，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之完整。”7 月 29 日，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以全省 3 000 万民众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指出：“现在和平

已告绝望,牺牲已至最后关头,舍全国总动员与之周旋,不足以谋取民族生存。”要求南京政府“当机立断,出师北上,扫荡强寇,固我河山,勿再希望不可得之和平。”8月3日,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表示要“抱定决心长期抗战,捐款劳军,毁家纾难。”号召全省人民“抱定决心长期抵抗,团结精神,严守纪律,镇静沉着,安定后方,经济绝交,制敌死命,肃清汉奸,以消隐患,捐款劳军,毁家纾难。”8月6日,该会再次电请南京政府明令对日宣战,指出:“寇深祸急,我国宜于此时对日宣战,将其暴行公告友邦,与世共弃,先发制人”,方是“取胜之道”。8月10日,长沙商人抗敌后援会通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迅速发起全面抗战。在全省人民的正义呼声和爱国热情的影响和感召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也电请南京政府“当机立断,抗敌雪耻,勿再委曲求全。”8月2日,湖南《大公报》撰文指出“:中央应当独立自主地抗战,改变依赖英美抗日的外交政策,因为日本国小民贫,外强中干”“,一战之威或有余,久持之力则必不足”,而中国地广民众,同仇敌忾,只要发动民众“,全体动员,作殊死斗争,方可以操胜券”“,最后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表达了一种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再次,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当时,各抗日救亡团体都看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发动民众的重要性,因此,纷纷走上街头,来到交通要道、渡口码头,深入到乡村,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了演讲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组织了八个宣传队分赴长沙四乡开展宣传;长沙邮电局职工“救国十人团”,集资订购抗日宣传书刊,向各界人士免费赠送;醴陵、茶陵、安仁的养路工人组织抗敌宣传队,沿路携带《抗日救国问答10条》10万份,沿醴、攸、安、耒公路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扩大宣传。中共湖南地下党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

动,以含光女校、英才小学、自治女校为基地,在中小学教员中和学生中开展救亡运动。澧县的中共地下党员在 7月份组建抗日民族先锋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些活动,对于唤醒民众的觉醒、动员民众参军参战、积极支援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组织汽车队、敢死队、义勇队、服务队、慰问队奔赴前线,直接支援抗战。

经过广泛的组织、宣传、发动,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觉悟了的湖南人民或者组织汽车队、敢死队、义勇队、服务队、慰问队奔赴前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或在后方抢修铁路、公路,保证交通运输线的畅通 或者开展抗日捐款,查禁仇货,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 年 8 月中旬,省公路局员工组织“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公路局提供 87 辆汽车,编为两个中队,分两批北上,分赴郑州、新乡前线,运输粮弹。潭宝公路 45 名司机和工作人员,驾 15 辆汽车开赴前线,担任运输。9 月,湘乡、衡阳、新宁、大庸、长沙等地民众组织抗日敢死队、义勇队和服务队开赴前线。

与此同时,湖南人民组织军运装卸队、运输队,加强军事运输,保证抗日部队的军需供应。粤汉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衡阳分会组织了 7 个军运装卸队,专门负责装卸军用物资 长沙、益阳、湘潭、湘阴、宁乡、桃源等地的码头工人组织运输工作团和接待站,保证军需运输和过境部队的物资供应 攸县、茶陵、安仁等县船工合组船运队,沿湘江开展支前航运。特别是湖南人民自备食粮,风餐露宿,肩挑手扛,用极简单的工具,在短短的一年内,筑成了 906.59 公里长的湘桂铁路,创造了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这条铁路的筑成,对予支持长期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湖南人民还积极行动起来,节衣缩食,捐献钱物,慰劳前线抗日将士。7 月 29 日,湖南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所属各学校开始募款劳军,他们手执小旗,佩戴黄色征募证,挨户劝募,并散发告

各界同胞书,呼吁大家一致起来捐款慰劳抗日将士,在他们的感召下，湖南各地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7 月 30 日,临澧县人民抗敌后援会将 300 元募捐款寄给 29 军将士，8 月 5 日,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征募部确定各界征募捐款的办法：商人限一月内缴足 20 万元,农、工、学生按月实行一角运动,妇女界发动特别救国捐款，如捐献结婚戒指等。从 8 月 18 日到 10 月 26 日,共募得 68 万余元、布鞋 40 000 双、毛巾 13 万条、药 30 余箱、棉背心 3 000 余件、棉鞋 10 000 余双。长沙人力车职业工会一面发动职员捐薪，一面制备竹筒悬挂在人力车上，向乘客劝募。粤汉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倡议全路员工捐薪半月购买重型轰炸机,工人们纷纷响应,仅路局机关和衡阳区段工人捐款即达 36 000 余元。衡阳抗敌后援会征募寒衣及防毒面具款项 23 400 余元、布鞋 25 000 余双、草鞋 900 双、斗笠 5 000 余顶。新化水口山抗敌后援会发动该矿局职工各捐薪 3 日。祁阳人民捐献的现金可购 1.5 架飞机。沅江人民捐献寒衣 2 000 余件、钢铁 10 000 余斤。宁乡县一女校师生将募捐到的现金买了棉花和青布,制成棉被 20 床、棉背心 100 件,并购毛巾 100 条、力士鞋 50 双,寄往前线。

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显示了湖南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它不仅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直接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及其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党的力量十分薄弱，基本上处于分散的地下工作状态。当时仅在湘鄂赣、湘赣、湘南红军游击区有完整的党组织,在长沙只有以刘道衡为首的中央特科和在长沙的以袁仲贤为首的中共湘江特委（特委下辖铜官区委、湘阴樟树港区委和益阳黄万泰染织厂党支部），湖南其他各县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状况与日益高涨的湖

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恢复和加强湖南党组织,以便推动和领导日益高涨的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就成为湖南党组织的当务之急。

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抗战爆发后到张治中主湘前。这一时期,由于湖南处于何键的反动统治之下，对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横加压制,对中共严密防范，并试图控制湖南人民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救亡运动,因此,这一时期,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十分缓慢,仍然处于秘密状态。

湖南党组织首先是在从外地回湘的中共党员推动下开始恢复的。抗战爆发后,从平、津、宁、沪等地高校和文化界回湘的一批知名人士和进步青年中有一批共产党员,接着,随着工厂内迁和各机关、各学校、社会团体来湘,又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长沙,这批共产党员一回到湖南就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湖南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发挥了模范骨干作用。9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在与刘道衡取得联系后,以自治女校、含光女校、育英小学为基地,团结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成为恢复湖南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国共合作建立后,各县市监狱释放了一批中共党员，逃亡在外的一些农村党员干部也陆续回到家乡,如蓝田的陈养吾、湘乡的邹祖培、溆浦的翟根甲、岳阳的杨乐如、王养植等,在家乡联络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37年 10 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成立后,即派任作民回湘,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密切配合下,大力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一方面与从平津宁沪等地回湘的党员建立组织关系,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另一方面,整顿中共湘江特委及其所属各区委,并派人到常德、湘潭、浏阳、衡山、衡阳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同时,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失散的党员,将分

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力量重新组织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后在长沙、益阳、湘阴、衡山、衡阳、湘桂铁路、湘乡、浏阳、湘潭、常德等地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委，以任作民为书记，下辖 3 个区委、23 个支部，共有 200 余名党员。

与此同时，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 1937 年 11 月撤销，另行成立中共湘赣边特委，以谭余保为书记，中共攸醴萍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以何德彪为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中共湘鄂特委，涂正坤任书记，他们分别抽出大量干部到各县市整顿和恢复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党组织初步恢复和建立起来后，特别是中共湖南特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各种读书会、宣传队，开展演讲、座谈、演戏、慰劳、支前等工作，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派党员参加各种进步抗日救亡团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积极影响和发动群众，推动湖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所有这些，为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阶段，张治中主湘到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这一时期，由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持友好态度，中共湖南党组织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大力发展各级党组织，党的组织由秘密转向半公开状态。这时期，湖南不仅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而且党员人数猛增，是湖南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7 年 12 月，张治中主湘后，中共中央派高文华、郭光州、欧阳方、白云华(王铁锋)从延安来湘工作，途经武汉时，高文华参加了中共长江局讨论湖南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湖南特委书记任作民的汇报后，决定成立中共湖南工作委员会，由高文华任书记。1938年 1月 16 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成立，省工委由高文华、任作民、郭光州组成。为加强省工委的领导，1938 年 5 月，中共长江局派聂洪钧来湘，调整了省工委领导班子，由高文华任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